話劇《一張報紙的抗戰》編劇朱海：在磨難中尋找抗爭意志

抗戰十四年，《大公報》的文化長征

【編者按】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由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袂打造的原創音樂話劇《一張報紙的抗戰》將於今年在北京和香港首演，並將在全國巡演。目前話劇劇本創作已經完成，由國家話劇院承擔演出任務。將《大公報》的抗戰歷史搬上舞台，對堅持文化自信和弘揚時代精神，都起到積極作用，觀衆翹首以待。

▶日軍當年在香港四處破壞，北角油庫燃燒起來，濃煙密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兩輛日本裝甲車在港島街上橫行，盡顯侵略者醜惡嘴臉。

「一紙風行，承國之重，江山載此，千秋共讀。」著名策劃人、編劇、詞作家朱海在杭州工作室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坦言，「時代給予我機會，能讓我這支筆飛起來。我想寫的話劇是能夠穿越歷史，能夠完整記載一個時代的人物，她就是《大公報》，所以我決心創作《一張報紙的抗戰》。」

大公報記者 茅建興杭州報道

談及這部話劇，擔任編劇的朱海難掩激動，《大公報》吸引他的除了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位報界巨頭外，還有范長江、蕭乾這樣的戰地記者，以及始終秉承「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辦報宗旨，一家報館，一群文人，一支筆，一張報紙。從「九一八」事變當年刊出「萬期，到抗戰勝利告捷刊出「萬五千期，堅守「絕不在日寇鐵蹄底下出版一天」的辦報理念，義不受辱，決不投降，不斷南下，六遷其址，一走就是十四年，足跡遍布天津、上海、武漢、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其戰地記者更活躍於東西方兩大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將「吃下砒霜，毒死老虎」的鏗鏘誓言，化作五千多個日日夜夜。「這是抗戰文化的一次偉大長征，從北到南，這非常不易，我深深為之感動。」

青年看此劇將獲益良多

「《大公報》這十四年是一段歷史的見證，構築了這份報紙波瀾壯闊的歷程。我們的創作是將國共兩黨共同抗戰在一部戲裏面同時展開，這是一次新的嘗試，而目前我們的主體創作已經完成。」朱海指出，就是因為有了抗戰的十四年，讓中華民族徹底覺醒，形成了國家和民族共同意識和精神，從這處意義上講抗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轉折點。「我特別希望在苦難中尋找精神的亮點，在磨難中尋找那種抗爭的意志。《一張報紙的抗戰》公演時，我相信從這個劇裏獲益最大的是今天的青年，以及一切熱愛和平、願意與中華民族並肩前行的世界各國人民。」

▶著名策劃人、編劇、詞作家朱海在杭州工作室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為了創作《一張報紙的抗戰》，他已翻閱了百多本書。 大公報記者茅建興攝

「重讀《大公報》抗戰報道，常常淚流滿面」

【大公報訊】在抗戰時期，《大公報》經歷了十四年特定的背景和環境，也在歷史上留下了很多功績輝煌、彪炳千秋的知識分子。談及此，朱海激辦報人往往忽略寫自己，新聞人在中國的舞台藝術上還幾乎是空白，我應該把他們寫出來。我相信《大公報》的這段歷史和故事，不受任何載體的影響，它傳播的是一個薪火相傳的民族精神，這一群人堪稱民族精神具象化的代表。如今是網絡和手機時代，媒體傳播的工具和載體換了，但精神不能換，信仰不能換，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是有現實意義的。」

傳播薪火相傳民族精神

為了寫《一張報紙的抗戰》劇本，朱海翻閱了逾百本書，包括新聞史學家方漢奇的《大公報百年史》，「讀這些書很艱難，原因是要去摳一些時代的細節，要去比對書和書之間同樣一件事的描寫。比如說當時有一個名篇《落日》，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見證日本在密蘇里艦上簽署投降書後所寫的長篇通訊，裏面寫了個細節，投降儀式結束的時間恰好是早上九點十八分，就要去核實和查對原件。再比如，在重慶的時候，毛主席給《大公報》題寫的「為人民服務」，我記憶中毛主席題寫過至少兩次「為人民服務」，一次是給黨內的，一次是給《大公報》的。對一家報紙提出了黨的宗旨，就說明《大公報》的魂來自於民間，是為人民服務的。」

他還透露，劇中寫進了「潍縣集中營」，也寫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謝罪碑。而作為一個重要的補充，他還是想整體的用一張報紙，大公報人，來講述輿論戰場上的抗戰。他們的名言就是「我們是軍人，沒有槍，拿支筆，勝過百萬兵」，就是這麼來的。「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披露日本侵華的文化隊伍，這支文化部隊叫筆部隊。觀衆看過關東軍，也看過「七三一部隊」，但是沒有舞台上看到過中日文化那種生死博弈。這個筆部隊我查了一下，日本軍部當年第一批公布就是在南京大屠殺以後，第一批赴中國的、赴侵華戰場上的二十二個作家，其中有好多人與魯迅很熟，裏面有個人叫林美子，她在戰爭以前八次來中國，五次見到魯迅。她很崇拜魯迅。但是因為軍國主義的瘋狂，導致那一代文化人和作家墮落了，偏激了，瘋狂了，反人性了。」

彰顯一份報紙巨大時代影響力

「這次創作對我自己就是一次精神和情感的洗禮，重讀《大公報》抗戰時期的報道，常常淚流滿面，不能自已，更加堅信歷史是抹殺不去的，也是否定不了的。這個劇裏面設計了一組年輕人，他們就站在當代，穿越整個歷史。這個劇本大大小小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將近三十多人，是一部大劇，彰顯一份報紙的巨大時代影響力。我希望劇中寫到的津、滬、漢、渝、港、桂這個城市的人都去看看這個戲，看看以《大公報》的名義戰鬥、生活、犧牲的那些報界前輩們，那些偉大的民族文化先驅，當時的場景都會再現，劇中也會呈現當時的演唱方式，《大公報》上的一批精彩文字已經摘出來了，包括社評和通訊中那些犀利帶着硝煙的，帶着戰鬥情感的文字都將在八十年後的舞台上再現。」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上月在北京聯合宣布，聯袂打造原創音樂話劇《一張報紙的抗戰》，將於今年搬上舞台。

▲《一張報紙的抗戰》策劃創作人員，在朱海的杭州工作室討論創作劇本。 大公報記者茅建興攝

落日

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

本報特派員朱啟平

簽字地點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日本簽字投降儀式，大公報特派記者朱啟平寫下通訊名篇。

國家話劇院院長田沁鑫：筆桿作槍 報館是營 展現中華民族不屈精神

【大公報訊】記者孫志北京報道：《大公報》作為「份承載着厚重史記憶與民族情懷的百年老報，其價值早已超越了新聞傳播的範疇。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大公報》用油墨與新聞紙築起抵禦外侮的精神防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國家話劇院院長、一級導演田沁鑫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表示，《一張報紙的抗戰》將《大公報》報人抗戰的歷史搬上舞台，讓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以更鮮活、更貼近當代觀衆的方式呈現，增強民族自豪感與文化認同感，對於傳承偉大抗戰精神，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首份獲密蘇里新聞獎中文報紙

田沁鑫說，「我們對於《大公報》的歷史價值、精神內涵，對於這張報紙在整個中文報業在香港及海內外讀者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在抗戰中發揮的作用，深感敬佩。力求使這齣話劇不僅成為一部展現歷史風雲的藝術作品，更能讓觀衆在回望歷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大公報》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其百年歷程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現代新聞史。尤其值得銘記的是，她歷經六次遷館的顛沛，卻始終堅守「不在敵人的鐵蹄下出報」。」田沁鑫對《大公報》的抗戰史娓娓道來：抗戰期間，即便報社館址屢遭戰火摧毀，編輯記者們仍輾轉於天津、上海、武漢、重慶、香港、桂林等地，在敵機轟炸的硝煙中堅持出報，用油墨與紙張築起抵禦外侮的精神防線。「這種，筆桿作槍、報館是營」的風骨，不僅是新聞人的氣節寫照，更折射出中華民族在危亡之際寧折不彎的脊梁。」

「時代變遷，但藝術工作者的使命，令她有共通的情感和強烈共鳴。田沁鑫感佩《大公報》這份堅守，讓她在世界新聞史上留下了獨特印記。一九四一年，《大公報》憑藉其在抗戰報道中展現的專業精神與人文關懷，成為首份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獎的中文報紙，這不僅是對其新聞品質的認可，更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新聞人在苦難中的堅守與擔當。

「而在烽火連天的歲月裏，《大公報》的戰地記者身影遍布中國及海外戰場——從「九一八」事變到淞滬會戰，從歐洲戰場的硝煙到太平洋島嶼的激戰，他們冒着生命危險發回的每一篇報道，都成為連接前線與後方的精神紐帶，讓「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壯與「四萬萬人齊蹈厲」的豪情，通過鉛字直抵國人心中。」

藉人物抉擇凸顯民族精神力量

如何將《一張報紙的抗戰》打造成一部傳承精神、激勵民族的經典之作，田沁鑫表示，具體來講，需在三個維度深耕：其一，以細節錨定歷史質感。既要有歷史縱深的宏大敘事，還要聚焦鮮活的具體人物。其二，用戲劇衝突激活精神內核，讓「民族精神」在人物的抉擇中凸顯力量。其三，借當代視角架起對話橋樑。可融入當代新聞人的回望，通過時空交錯與當年的報人對話，探討「在流量時代如何守護新聞初心」。這種古今對照，既能讓歷史照進現實，也讓年輕觀眾在共情理解：前輩們用生命捍衛的，正是我們今天仍需堅守的精神家園。唯有如此，大公報的故事才能超越「史料陳列」，成為一部讓觀眾在淚光中讀懂「何為氣節、在震撼中傳承「民族精神」的永恆之作。

田沁鑫介紹，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資源豐厚，不僅擁有一批德藝雙馨的藝術家和極具潛力的青年演員，更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多元化的藝術資源。具備打造精品劇目、傳遞時代精神的堅實基礎。國家話劇院將全力支持《一張報紙的抗戰》的創作和演出。

▲中國國家話劇院院長田沁鑫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表示，將《大公報》報人抗戰的歷史搬上舞台，對傳承偉大抗戰精神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一九四一年《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授予「最佳新聞服務獎」，是迄今唯一獲此殊榮的中文媒體。

報人風骨 徐鑄成拒為日寇辦報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徐鑄成，這位中國著名記者與新聞評論家，曾任《大公報》記者、桂林和上海版總編輯，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的重要見證者。他的《徐鑄成日記》裏，記載了一段日佔初期驚心動魄的虎口脫險經歷。

資金糧米利誘 不為所動

香港淪陷後的一天上午，兩名日本兵和一名臂纏紅布的廣東人闖進《大公報》宿舍，指名要找金（誠夫）經理與負責編務的編輯主任徐鑄成。兩人被帶上一輛「掃着「日軍×師團報導部」旗」的汽車，押到了德輔道的一幢大樓，見到身着軍裝、佩中佐級肩章的「多田部長」。多田不用翻譯，中國話講得相當好。他直言《大公報》雖是抗日報紙，但日軍可以「不咎既往」，只要合作復刊，資金、紙張、糧米都會供應。原因很簡單，別的報紙「沒有力量」，而《大公報》在國際上有影響。

然而，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日軍侵華步步進逼，《大公報》同仁不願受日軍壓制，仰人鼻息，早已立誓決不在日寇鐵蹄下辦報一天。先後六次遷館，雖顛沛流離，卻始終昂然不屈。

面對多田的拉攏，兩人以紙張燒毀、銀行停業為由推辭，多田執意要兩人主持，還催促提供預算與人員名單。兩人故意稱需要原班編輯部才能保證質量，又說許多同事已失聯，藉此拖延。

離開時，翻譯特意指着對面房子冷冷暗示「已被監視」。翌日，多田再次詢問是否「想通」，兩人依舊以缺人困難為由周旋，還交出一份早知無法找到人的名單。

終於在天剛亮時，徐鑄成換上舊唐裝，從宿舍後門溜走，混入碼頭，擠進船艙，成功虎口脫險，奔赴廣西繼續出版桂林版《大公報》。

◀一九三九年春節（二、二）與政左季鸞（二四、五）與社長胡霖（二）、總主筆張季鸞（二）、總經理張季鸞（二）、總編輯張季鸞